

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

战国策译注

□ 韩峥嵘
□ 王锡荣

注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Zhàn guó cè Yì zhù

战 国 策 译 注

王锡荣 韩峥嵘 注译

责任编辑:李本达

封面设计:余 力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4.25 印张 5 插页 820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长春凯旋福利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6 000 册 定价:42.00 元

ISBN 7—80626—295—4/1·53

前言

《战国策》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行的一部重要典籍,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,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今天能把我们为它所作的全注全译付梓,以正于读者和方家,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。

《战国策》是西汉末年刘向校订、整理“中秘书”(宫廷藏书)所取得的一大成果。刘向《战国策叙录》云:其底本众多,“或曰《国策》,或曰《国事》,或曰《短长》,或曰《事语》,或曰《长书》,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,为之策谋,宜为《战国策》。”其文字混乱而且体例不一,“中书余卷,错乱相糅莠,又有国别者八篇,少不足。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,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,除复重,得三十三篇。”由此可见,《战国策》乃是刘向采录若干同类文献,采取国别体加以校正、删汰、补充、编次,并命名而成。

显然,作为群书荟萃的《战国策》,其作者绝非一人,相传乃是各国史官或策士。他们究竟是谁,已不可考。现代学者罗根泽先生曾根据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太史公曰“蒯通者,善为长短说,论战国之权变,为八十一首”,撰写《〈战国策〉始作于蒯通考》,他说:“《战国策》所记,非一时之事,非一人之言,而全书一律,自成一体,知出一人一手董理润色。”又说:“刘向校书之时,已有数种

体,或多或少,参差错乱,向据多者补少者,除其重复,于是定著三十三篇,正名为《战国策》。故此书盖始作于蒯通,重订于刘向。”然则罗氏所谓“作”不过是“董理润色”而已。其实,司马迁是说蒯通深谙“战国之权变”,擅长纵横之术,以之作为蒯通作《战国策》的证据,怎能使人信服呢?

《战国策》的流传曾有一番周折。东汉末年,延笃作《战国策论》一卷,高诱作《战国策注》二十一卷,或谓三十二卷。到北宋时,据王尧臣《崇文总目》云,刘向校录本尚有二十二卷(清钱绎按:“《隋志》、《通志略》并二十一卷。”),高诱注释本仅存八卷。于是曾巩寻访校补之,其《战国策目录序》云:“刘向所定著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,《崇文总目》称十一篇者阙。(按:宋元间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云:《崇文总目》谓“第二至十、三十一至三十三阙。”然则此“十一”当作“十二”。)臣访之士大夫家,始尽得其书,正其误谬,而疑其不可考者,然后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复完。”遗憾的是散佚的《高诱注》,他并没有找到。尽管如此,曾巩对于《战国策》的流传是立了大功的。

南宋初年,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,接连出现两种新本子,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六年(1147)的姚宏续注本,一种是成书于绍兴十七年(1148)的鲍彪新注本。姚本三十三卷,卷数、篇次悉如曾本之旧,其中二至四卷、六至十卷为尚存的高诱注,其余各卷为姚宏的续注。姚宏还以北宋的几种本子加以对校,点勘较为精审。其自序云:“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,皆余所益。”所题校者,“曾”即曾巩,“钱”即钱藻,“刘”即刘敞,“集”即集贤院。可贵的是,姚宏已开始运用《史记》等书与《战国策》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,有新的创获。明代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,各卷皆题“高诱注”,这是传写的错误。鲍本十卷,其特点是:移《西周策》于《东周策》之前,按年月调整部分策文的次序,每国策文分别加标王号,不采高诱注而自为之注,对本文有所增删改动。鲍彪用尽毕

生精力,四易其稿,疏通诠解之功不可埋没。后来,赵与时《宾退录》评论说:“《战国策》旧传高诱注,残缺疏略,殊不足观。姚令威宽补注(按:补注者为姚宏,此误为姚宽)亦未周尽。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,虽间有小疵,殊不害大体。惟东西二周一节,极其舛谬,深误学者,反不若二氏之说。”

到了元代,吴师道认为鲍本仍多未善,遂在鲍本的基础上加以补阙订正,完成《战国策校注》十卷。吴师道取姚本与鲍本参校,并杂引诸书进行考证,凡增其所阙者谓之“补曰”,凡纠其所失者谓之“正曰”。因鲍本篇次有所移易,故附录刘向、曾巩所校三十三卷四百八十六篇的目次,以存其旧。吴师道也采用了运用《史记》等书与《战国策》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,而且做得更为认真。

清代研治《战国策》颇有成绩的是黄丕烈和王念孙。黄丕烈据宋槧重刊姚本,并用家藏吴本互勘,撰写《战国策札记》三卷。其中详列鲍本、吴本之异同,并参照《史记》等书校订姚本,采用了同时代的段玉裁、顾广圻等人的说法。王念孙参考大量有关资料,以其文字、声韵、训诂的非凡功力,撰写《战国策杂志》三卷,对今本《战国策》的讹误多所匡正,极为精到,非前人可比。

晚近以来,考释《战国策》的著作又有数部,其中重要的有金正炜的《战国策补释》、缪文远的《战国策考辨》和《战国策新校注》、诸祖耿的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等。另外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校点本《战国策》,以姚本为底本,汇集鲍彪、吴师道的注文及黄丕烈的札记,乃是《战国策》流传至今较为完善的本子。1984年重版时,它又把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在后面,不仅可以补今本《战国策》之不足,而且在校勘上也颇有价值。

《战国策》是一部无以取代的珍贵的历史文献。战国时代的历史文献,由于秦始皇下令“非秦记皆烧之”,大都荡然无存,惟有战国策书和《竹书纪年》有限几部。这是仅就以记载历史事件和世系为主的文献而论的,没有把重点不在记录史实的诸子计算在内。《竹书纪年》所载战国史事只是魏国之事,与史料甚丰的《战国策》不可相提并论。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,所述战国史事,大都取资战国策书,宋人姚宽统计凡九十三事,今人郑良树统计共一百四十九处。

《战国策》可谓战国时代的一面镜子。“战国”作为时代名称始于刘向,他指的是“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”,而一般则依据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定为周元王元年(前475)至秦始皇二十六年(前221)。战国时代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、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巨大变革时代。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度刚刚确立,各诸侯国独占一方,割据称雄,几个强大的诸侯国都想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,于是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,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领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。与此同时,各诸侯国内部也不断进行着争权夺势的斗争。所有这一切,都在《战国策》所载的谋臣、策士的言行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

统观《战国策》十二国策,可谓战国七雄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以及其他五国东周、西周、宋、卫、中山的兴衰史,经过诸家如林春溥、顾观光、雷学淇、于鬯、陈梦家、杨宽、范祥雍的系年,莫不可见来龙去脉。其中战国前期之事所载不多,仅有赵魏韩“三家分晋”、齐“围魏救赵”等几件大事;而战国中、后期之事则纂辑甚丰,展现了各国之间合纵与连横的外交策略斗争,激烈而

频繁的兼并战争和秦统一六国的过程。此间的重大事件,诸如齐大破魏军于马陵(前 341 年);秦败楚取其汉中地(前 312 年);燕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伐齐(前 284 年);楚败于秦失鄢、郢(前 278 年);秦、赵争夺上党大战于长平(前 260 年);韩、魏、楚、燕、赵、齐六国相继灭亡(前 230—前 221 年),皆有所载。尤其可贵的是,其中暴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残暴、愚蠢自私,反映了人民在兼并战争之中的痛苦生活。

《战国策》作为一部游说之士的言行辑录,肯定了士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在外交上的作用。士这一阶层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,他们或是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由贵族没落下来的,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由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。他们大都是文化人,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,纷纷阐述并千方百计施行自己的主张和策略,在诸侯竞相争雄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此,有些开明的国君(如齐威王、魏惠王、燕昭王等)和权贵(如孟尝君、信陵君、平原君、春申君四公子等)都把他們作为“智囊”多方招纳、大批豢养。他们则仰首伸眉,敢说敢为。例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“好马、好狗、好酒、好色”,惟独“不好士”;颜颀面对“忿然作色”的齐宣王,断然回答“士贵耳,王者不贵”;冯谖替孟尝君“收债于薛”,竟“以债赐诸民,因烧其券”,为孟尝君“市义”。虽则如此,尽忠效力于统治者,才是士这一阶层得以存在的前提。

战国中、后期,通过商鞅变法,秦国日益富强起来,企图蚕食六国,统一海内。在这种情况下,谁胜谁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的强弱,但是更重要的则取决于策略的得失,正如刘向所说:“横则秦帝,纵则楚王。”因此,当时绝大多数的士,用韩非的话说,不是主张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的合纵派,就是“事一强以攻众弱”的连横派,统称纵横家。其中虽然有像鲁仲连那样“义不帝秦”、“为人排患、释难、解纷乱而无所取”的“高士”,但大多

数是像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那样的贪图功名利禄的两面派。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，游说于诸侯之间，言无真理，行无准则，纵横捭阖，朝秦暮楚。例如苏秦起初以“连横”说秦王，“书十上而说不行”，乃转而以“合纵”说赵王；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，既仕楚而又贰于秦。他们这两手制约着七国相争的局势，他们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，就此而论，《战国策》也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。

《战国策》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，但它并非皆为信史，其中某些篇章纯属虚构。在全书四百九十五章中，大体可信的占五分之四以上，多所虚拟的不足五分之一。这种情形，司马迁早已发现，他说：“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”（《史记·苏秦列传赞》）兹举《秦策一·苏秦始将连横》为例，其中苏秦说秦惠王云：“大王之国，西有巴、蜀、汉中之利，北有胡貉、代马之用，南有巫山、黔中之限，东有肴、函之固。”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之辞。理由是：（1）据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，苏秦活动在齐闵王、燕昭王时代，于秦相当于昭王之时，上距秦惠王三十余年；（2）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秦灭蜀在惠王后元九年，取汉中在后元十三年，取巫、黔在昭王三十年，至此惠王已死三十四年；（3）胡、代在赵国之北，皆非秦地。有鉴于此，从历史角度读《战国策》是不可不考辨虚实真伪的。

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改变以往书目入《战国策》于史部杂史类而归之于子部纵横家，他说：“历代以其纪诸国事，载于史类。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，难尽信，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，当附于此。”尔后，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因之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案班固称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迄于天汉。则《战国策》当为史类，更无疑义。且子之为名，本以称人，因以称其所著，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。《战国策》乃刘向裒合诸记，并为一

编,作者既非一人,又均不得其主名,所谓子者安指乎?”

关于《战国策》的思想内容和文献价值,刘向认为其中“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策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。亦可喜,皆可观。”这是比较公允的。而曾巩不以为然,他说:“[刘向]率以谓此书战国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,不得不然,则可谓惑于流俗,而不笃于自信者也。”他认为谋士之言虽为“邪说”,但“岂必灭其籍哉?放而绝之,莫善于是!……至于此书之作,则上继春秋,下至秦汉之起,二百四五十年之间,载其行事,固不得而废也。”他还是充分肯定了《战国策》的史料价值。而吴师道《书曾序后》则极力发挥曾巩“放而绝之”的主张,认为邪不压正,即使是小人“得是书而究之,则将有不为者矣”。清代陆陇其认为:“其机变之巧,足以坏人心术。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,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!”他便撰写《战国策去毒》,使之“不中其毒”。我们认为,《战国策》是一部内容丰富、文献价值不可低估的书,因它记载了某些策士的丑恶行径,就把它视为大毒草,这是非常不公正的。

三

《战国策》的文学价值很高,古往今来,学者们无不津津乐道,就连视之为“邪说”者也不例外。宋李格非说:“其事浅陋不足道,然而人读之,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,文辞之胜移之而已。”(《书战国策后》)王觉说:“虽非义理之所存,而辞丽横肆,亦文辞之最,学者所不宜废也。”(《题战国策》)鲍彪说:“其文辩博,有焕而明,有婉而微,有约而深。”(《战国策注序》)清陆陇其说:“其文章之奇,足以悦人耳目。”(《战国策去毒跋》)吴曾祺说:“其文章之美,在乙部中,自《左》、《史》外,鲜有能及之者。”(《战国策补注叙例附言》)

长于叙事,有如小说,这是《战国策》首屈一指的特点。近人胡怀琛说:“《战国策》原为史类之一书,由今观之,吾人可云,其书大半是小说。”这就是《战国策》使人爱不释手的根本原因。《战国策》叙事的小说性,表现在以下三方面:

一是富有故事情节,引人入胜。例如《齐策四·齐有冯谖者》,写的是策士冯谖为孟尝君效力的故事:一写冯谖寄食到孟尝君门下,自谓“无好”、“无能”,竟三次弹铗而歌,迫使孟尝君待他为上客;二写冯谖自告奋勇为孟尝君收债于薛,竟“起矫命,以债赐诸民”,声称孟尝君“市义”,一年后孟尝君罢相回薛,“民扶老携幼”迎接他,他才发现冯谖足智多谋;三写冯谖为孟尝君经营“三窟”,遂使孟尝君复位,“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”。这“三部曲”写得迂回曲折,出人意料;首尾一贯,详略得体;生动深刻,耐人寻味。再如《韩策二·韩傀相韩》,也可以说是“三部曲”:其一为序曲,写严遂为报与韩傀之仇,特与聂政结交,颇能理解聂政赡养母亲的孝心,并不急于要求聂政为他行刺;其二为正曲,写聂政母死除服,便挺身而出为严遂报仇,竟然谢绝所派车骑人徒,独闯戒备森严的东孟之会,直刺韩傀兼中哀侯,遂“自皮面抉眼,自屠出肠”而死;三为尾声,写聂政之姊去韩国认尸,“不避菹醢之诛”,“抱尸而哭之”,大扬聂政之名,遂“自杀于尸下”。这“三部曲”一气呵成,真是波澜起伏而动人心魄,之所以连续推出直臣、勇士、烈女三个人物,一则以言士为知己者死,二则以彰聂氏姊弟之情,从而突出了聂政孝悌与豪爽的性格。

二是善于刻画人物,栩栩如生。例如《秦策二·苏秦始将连横》所塑造的苏秦形象,血肉相当丰满,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它以语言、肖像、行动、心理的多方面描写,把苏秦以连横说秦失败和以合纵说赵成功前后的表现加以对比,揭示了苏秦能言善辩、刻苦自励、投机钻营的性格特点和贪求功名利禄的内心世界。最精彩的是以下两段结合环境描写的心理描写:一段是

“归至家，妻不下纊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。苏秦喟然叹曰：‘妻不以我为夫，嫂不以我为叔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皆秦之罪也。’”一段是“将说楚王，路过洛阳。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，张乐设饮，郊迎三十里；妻侧面而视，倾耳以听；嫂蛇行匍伏，四拜自跪而谢。苏秦曰：‘嫂！何前倨而后卑也？’嫂曰：‘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。’苏秦曰：‘嗟乎！贫穷则父母不以为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，人生世上，势位富贵，盖可忽乎哉？’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炎凉世态，对苏秦的重要影响。再如《赵策三·秦围赵之邯郸》所塑造的鲁仲连形象，则不同凡响，光彩照人。它通过鲁仲连与辛垣衍就“帝秦”与否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论战，歌颂了鲁仲连坚持正义，不畏强暴，疾恶如仇的英雄品格；通过鲁仲连迫使秦军退却一再推辞封赏的言行，赞美了鲁仲连“为人排患、释难、解纷乱而无所取”的高尚情操。鲁仲连这个“天下之士”的形象，几乎都是用语言描写树立起来的。

三是对话颇似戏剧，令人喝彩。例如《赵策四·赵太后新用事》，记叙了触龙劝谏赵太后“以长安君为质”的一番对话。当时赵太后十分恼怒，声称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”然而触龙居然能够打破僵局而取得圆满成功；他关切地问候生活起居，赵太后不能不答，气氛由紧张而缓和；他以“爱怜少子”为由请求关照，赵太后言“妇人异甚”暗示舍不得以少子为质，气氛由融洽转对立；他大胆指出赵太后爱子不若爱女，赵太后不同意，虽有争议气氛还算平和；他进而以赵国历史为鉴，动之以深情，晓之以大义，终于使赵太后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令长安君“有功于国”的主张。这番对话写得如此入情入理，扣人心弦，一场好戏莫过于此。再如《魏策四·秦王使人谓安陵君》，更是一篇充满戏剧冲突的杰作。写的是唐雎受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，以大智大勇，唇枪舌剑驳回了秦王的易地要求，胜利地完成了使命。唐雎与秦王的对话，真是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，斗至第四

回合,他义愤填膺地说:“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,天下缟素,今日是也!”随即“挺剑而起”,“怫然怒”的秦王,顿时“色挠,长跪而谢之”,连连告饶:“先生坐!何至于此!寡人谕矣。夫韩、魏灭亡,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,徒以有先生也。”这么一场激昂慷慨的正气歌,如果搬上舞台,必将取得掌声雷鸣的艺术效果。

上述叙事的小说笔法,始见于《左传》,譬如《郑伯克段于鄢》、《晋重耳之亡》、《晋灵公不君》等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以上长处。《战国策》较之《左传》,可谓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,那就是它做了相当大的艺术概括和加工。固然某些篇章史无所载或史有出入,史学家以为是“拟托”,没有史料价值;然而文学家则视之为“创作”,很有文学价值。譬如上面所举的《苏秦以连横说秦》、《鲁仲连义不帝秦》、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以及《秦策二·医扁鹊见秦武王》、《齐策一·邹忌修八尺有余》、《齐策四·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》诸篇,都是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,皆为《战国策》的精华。

其次,长于议论,可比诸子,乃是《战国策》另一显著特点。清人张士元以之比于孟子:“《战国策》与《孟子》纯驳绝异,然《赵策》魏牟见赵王,论为冠之必待工,及客论买马之必待相马工,二者风治天下之不用贤,皆与《孟子》论巨室璞玉相似;《魏策》惠子为田需言杨树易生,亦与《孟子》论齐王不智相似。”(见于《嘉树山房集·书战国策后》)就其文采而论,清人章学诚说:“其辞敷张而扬后,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。”(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)这种风格表现在以下三方面:

一是论辩善于抓住要害,单刀直入,鞭辟入理,既有针对性,又有逻辑性。例如《赵策三·秦攻赵战于长平》虞卿对楼缓“赂秦”论的批驳,《秦围赵之邯郸》鲁仲连对辛垣衍“帝秦”论的批驳,都是一针见血,有理有据,最终使对方理屈辞穷的。

二是说理常用寓言故事,深入浅出,言简意赅,既有明快感,又有幽默感。例如《楚策一》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,《燕策二》苏代以鹬蚌相持谏赵惠王,《魏策四》季梁以南辕北辙说魏惠王,《燕策一》郭隗以千金买骨谓燕昭王等等,无不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,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。

三是表达讲求语言艺术,比喻夸张,对偶排比,既有形象美,又有形式美。例如《秦策一》苏秦以连横之策说秦惠王,利用大量骈辞俪句,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;《楚策四》庄辛以图治之说谏楚襄王,以物喻人,由小及大,句用对偶,段用排比,步步紧逼反复讽说。章炳麟云:“短长诸策,实多口语。寻理本旨,无过数言,而务为纷葩;期于造次可听。溯其流别,实不歌而诵之赋也。秦、代、仪、轸之辞,所以异于《子虚》、《大人》者,亦有韵、无韵云尔。”(《检论》卷五)

四

《战国策》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相当深远的。

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,《战国策》上承《左传》下启《史记》,在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之际起了桥梁作用。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,创始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,《战国策》已有一些雏形,譬如《齐策四·齐有冯谖者》有如一篇《冯谖传》,《韩策二·韩傀相韩》可谓严遂、聂政、聂政之姊的三人合传。《史记》许多篇“本纪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取材于《战国策》,写法自然要受到《战国策》的影响。

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,《战国策》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,对于后代的传记文学和传奇小说是有直接影响的。再者,《战国策》的驰骋俪句和排比敷陈的风格,对于汉代大赋的产生,大抵也有催化作用。譬如西汉枚乘的《七发》在构思和布局方面,同

《楚策四·庄辛谓楚襄王》就十分相似。另外,《战国策》中还有几篇奇文,如《中山策·中山与燕赵为王》章,张登与望诸君对话时,竟让望诸君扮演齐王,由他来游说,并让望诸君断其成败,犹如现在曲艺表演的“一赶二”(参见张清常《战国策笺注前言》)。如此说来,这样的奇文,或许还是说唱艺术的滥觞呢。

若就《战国策》对后世作家的影响而论,亦不乏其例。汉初贾谊、晁错、邹阳等人的文章,如《过秦论》、《论贵粟疏》、《狱中上梁王书》,都有明显的战国纵横辞说之风。当时《战国策》尚未成书,固然不能说他们受了《战国策》的影响,但是说他们受了《战国策》所本的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之类的影响,则是不容置疑的。唐代韩愈、柳宗元、陆龟蒙等人的“杂说”、“小品”,显然是与《战国策》那些脍炙人口的短文一脉相承的。《战国策》对于宋代苏洵、苏轼父子议论文的影响尤为显著,“苏洵的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及其他史论,苏轼的《策略》、《策别》、《策断》、《志林》诸论及其他策论、上书,论人论事,都在学习《战国策》中获得丰富的有益的经验。”(见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一)

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,《战国策》的巨大影响,那就是它“实多口语”(章炳麟语),为日趋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注入了大量的鲜活的血液,使之更加富于表现力。《战国策》中的口语从哪里来?自然是可谓“辘轳使者”的策士们连同寓言故事从民间采集来的。如此说来,战国策士周旋于各国之间的纵横游说,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,是有所贡献的。以《战国策》的语言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及诸子之书的语言相较,显然它是有过之无不及的,语汇更加丰富,句法更加严谨,修辞更加考究。以《战国策》的语言与《史记》以及贾谊、晁错之文的语言相较,恐怕很难找出它有哪些差距,几乎是同样通俗易懂、生动活泼、富有魅力的。

过去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历史条件下,作为“纵横家所

著”的《战国策》连个合法地位都没有,明代李梦阳把它宣判为“畔经离道之书”,但是它的影响是谁也消除、限制不了的。李梦阳说:“然而天下传焉,后世述焉。”谓之有四方面的影响:“录往者迹其事,考世者证其变,工文者模其辞,好谋者袭其智。袭智者譌,模辞者巧,证变者会,迹事者该。”(引自《空同子集》)可见他至少认为《战国策》有一个不良影响,不可因袭其智谋以欺诈。这种把智谋与欺诈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极其迂腐可笑的。我们认为,《战国策》所保留的当时各国在外交上的大量斗智资料,有许多是值得借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,正像《孙子兵法》那样。张清常先生说:“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,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?”(见《战国策笺注前言》)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。

五

本书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重印《战国策》为底本注释、翻译的。分章、标题、划段基本上一仍其旧。

统观《战国策》全书,绝大多数篇章还是明白晓畅的,但是难以卒读之处实在不少,尚有许许多多难拔的“钉子”。究其根源有三:一是全书裒合众籍纂辑而成,多所牴牾,难以梳理;二是其文讹夺衍舛俯拾即是,校不胜校,难以勘正;三是其事或虚或实层见叠出,众说纷坛,难以考辨。这些“钉子”拔不掉,全注全译就不可能。好在刘向以后至于现今,致力于勘正、考辨《战国策》的学者不少,著述良多,今天才有了全注全译的可能性。兹将我们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后,用以表明我们对这些著作的珍重与师承,对其作者们的仰慕与感谢。

本书的体例是:(1)题解,加在各国策文之前,介绍该国的历史沿革、地理位置、策文情况等。(2)注释,每篇题目之下皆有注

①,为该篇所述史实系年,有与史不合处则指出,若于史无征属于虚拟者则视为拟托;其余各条注文,一般按校正文字、训释词语、串述大意的顺序排列,必要时则施以必要的考证和评论,以补译文之不足。(3)译文:以直译求其“信”,以意译求其“达”,尽量兼顾读者学习语言与文史的需要。

本书分工:东周、西周、秦、齐、楚、燕、宋卫、中山诸策的注译,由王锡荣担任;赵、魏、韩诸策的注译,由韩峥嵘担任。

由于我们学殖不深,功底浅薄,虽则龟勉从事,切磋琢磨,亦不敢自信,无以自安。亟望海内外专家、读者予以批评指正。

韩峥嵘

1997年4月于剔吸居

主要参考书目

(一)

- 高 诱 《战国策注》
姚 宏 《战国策续注》
鲍 彪 《战国策校注》
吴师道 《战国策校注补正》
黄丕烈 《战国策札记》
王念孙 《读书杂志·战国策杂志》
金正炜 《战国策补释》
郭希汾 《战国策详注》
缪文远 《战国策考辨》
 《战国策新校注》
诸祖耿 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

(二)

- 吕祖谦 《大事记》
林春溥 《战国纪年》
黄式三 《周纪编略》
顾观光 《国策编年》